

上篇

难 忘 小 平

刘 华 清

今年 8 月 22 日,是邓小平同志诞辰 100 周年纪念日。

小平同志离开我们已经 7 年了。7 年多来,他的音容笑貌常在我脑海中浮现。小平同志逝世前后的情况我仍记忆犹新。

1997 年 2 月 19 日,小平同志在北京病逝。

在中国,继毛泽东主席之后,小平同志是世界公认的又一位伟人。他的去世,在外部世界产生巨大反响,许多国家领导人纷纷来电表示哀悼,给予高度评价。美国总统克林顿认为,邓小平“在过去 20 年是世界舞台上一位不凡的人物”。法国总统希拉克说:“在本世纪内能够像邓小平一样领导如此庞大的人类社团,经过这么深远而有决定性转变的实在罕有。”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发言人则称:“全世界都应该谨记,邓小平是中国现代化的总设计师,无可估量地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

小平同志去世前,已经住了较长时间医院。年初,他的病情明显加重,中央打招呼,要求中央领导同志不要离京。这时正是新年和春节之交,事情很多。我忙着工作,同时要求工作人员随时注意小平同志的病情通报。几天后,通报说小平同志病情稳定,不会马上有什么大事,大家有事可以去办了。2 月 4 日,中

央政治局常委全体同志前往三〇一医院看望小平同志，表达春节问候。2月14日，接到中央紧急通知：小平同志病危。

2月19日，是小平同志逝世的日子。

当天我出席了全国国防科技工业会议，在会上讲了话。几天来一直牵挂着小平同志病情，身心疲惫。这天晚上准备休息了，突然接到中央通知：召开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邓小平同志逝世了！

虽然生老病死是自然法则，但听到小平同志去世的消息，我在思想感情上还是难以接受。当晚，政治局常委集体赶到三〇一医院，向小平同志遗体告别。

我是战争年代过来的人，一生见过无数死亡，送走过许多战友和领导。可是，小平同志的离去令我格外悲痛，有种难离难舍的感觉。这种情感，来自战争年代生死与共的同志情谊，来自半个多世纪他对我的爱护、教诲和信任，也来自我对他的政治智慧的钦佩和人格魅力的无比敬重。一连数日，心情都很沉重。

2月24日，我参加了在三〇一医院举行的小平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告别厅里，小平同志面容安详，静静躺在鲜花丛中。再也看不到他的睿智目光，听不到他的谆谆教诲了。根据安排，告别仪式后小平同志的遗体要去火化，这将是见他的最后一眼……我立正敬礼，泪眼模糊。

恍惚间回到了66年前的洪洞县马牧村八路军总部，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小平同志。他刚被任命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委，我领受了警卫护送他回师部的任务。当时我是一二九师司令部秘书主任，才22岁，经验不多，回程中没有带经费，结果路过新区时，没有当地政府保障了，差点让小平同志连饭都吃不上。出发时，我们坐了一辆烧炭的汽车，经常出毛病。小毛病修修还能开走。一次出毛病后，开不动了，我惴惴不安，小平同志却毫不在意，骑上我借来的马，谈笑风生，一路烟尘赶到了师部。当时

我哪会想到，和小平同志的这次相遇，会对我的一生产生那样深远的影响。也更不会想到，此后数十年间，当年的邓政委会在中国的政治舞台如此活跃，对中华民族的振兴做出这样巨大的贡献。时间真快，眨眼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恋恋不舍看了小平同志最后一眼，默祷：老人家，您走好。

从医院回到家里，我浮想联翩。小平同志一生大起大落，波澜壮阔，无比辉煌。作为一个生命个体，他是创造了人生奇迹的伟人。如果说他还有遗憾，也许是没能看到香港回归。他说过，香港回归如果身体不好，坐轮椅也要去。但只差半年时间了。小平同志可以自慰的是，他在身后留下了丰厚的精神遗产。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人生是功德无限的。毛泽东主席说过，人总是要死的，有的重于泰山，有的轻于鸿毛。小平同志死得重于泰山。

家中保存的相册里，有我和小平同志的一些合影。翻看照片，思绪活跃。小平同志是 1977 年重新复出的，当时已经 73 岁的高龄。对普通人来讲，73 岁，这是含饴弄孙、颐养天年的日子。对小平同志而言，却是又一次建功立业的好时光。其后的十多年里，他领导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总设计师的形象，领导中国人民大刀阔斧地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大胆地制订了一系列特区经济政策，开放市场，引入外资，高瞻远瞩，为中国开拓了崭新而广阔的市场经济天地，也实质性地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他的引导下，中国从自我封闭中重新融入世界政治舞台。一位年迈的老人，凭着过人的智慧和毅力，凭着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鞠躬尽瘁，创造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

缅怀小平同志，我也为自己深感庆幸。和许多同志相比，我的幸运是较早接触了小平同志，并多次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这是一份长达近 60 年的革命情谊，也是一次次让我终生受益的教诲和指引。参加革命时，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家子弟。凭着对事业的忠诚，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往前走。我没有奢望，

只求能在有生之年为党和人民多做点事情。小平同志一直在关注我的成长。

按照中国人的说法，人生 70 古来稀。

1987 年 10 月，我已经 71 岁。我们这些从战争年代过来的人，能跨越古稀之年，值得庆幸。漫长岁月里，许多年纪相仿的战友，有的在枪林弹雨中倒下，有的被疾病拖垮，我不仅熬了过来，而且身体状况不错。不过我很清楚，长江后浪推前浪。我在海军司令员的岗位上已工作 5 年了。为了海军事业的发展，作为海军司令员，该交出“接力棒”了。我作好了退休的心理准备。

命运却给我做出另外的安排。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我和洪学智担任军委副秘书长。

小平同志曾经指着我对大家说：“调他来，就是抓现代化，抓装备。”

我本以为此生事业到此告一段落，却出乎意料走进了军委机关，又一次在小平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

1989 年 11 月 6 日至 9 日，作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我列席了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会议进入了人事酝酿阶段时，对于我的工作安排，又让我感到意外。

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同志都住在空军大雅宝招待所。那天，会上印发了军委主席邓小平 9 月 4 日上午与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杨尚昆、万里同志的谈话要点材料。这份“要点”中谈到：小平同志主动提出，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提名江泽民任军委主席，杨尚昆兼副主席，刘华清任副主席，杨白冰为秘书长。

我吃惊了：小平同志提名我当军委副主席！

我感到自己能力难以胜任。于是，给小平同志办公室打电话，请他们向邓主席报告：“还是选别人好。”邓办的同志告诉我：“邓主席已经定了，不会改变。”

我不再坚持了。从小平同志讲话的“要点”中可以看出，他思想得很远，考虑的是中国的安全，中国的未来。他说：党要管军队，因为军队始终是党的。军队是党的军队，当然也是国家的军队。“我们军队要成为一个听党的话的军队。我们的传统是军队不能搞集团，不能搞小圈子，不能权力集中在几个人身上，军队任何时候都要听中央的话，听党的话，选人也是要选听党的话的人。军队不能打自己的旗帜，所以，既然变动军委主席，也要考虑军委组成人员和工作机构问题，连同我的问题一同解决比较好。”

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了根据邓小平主席提议和中央政治局会议议定的中央军委人事安排。对于新一届中央军委的其他人事安排，我衷心拥护。但全会决定我担任新的军委领导职务，我从没想到过。但事已至此，我只有真诚感谢党和同志们的极大信任，下决心加强学习，依靠全军广大官兵，尽职尽责，努力工作，不负重托。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重要成果之一是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写进党章，确认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全党在新时期的思想理论基础。小平同志说过，他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他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在十四届一中全会上，我被选进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成长为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者，我的这一成长经历，在我们革命队伍中是带有普遍意义和典型性的。这是党的培养，也离不开小平同志对我的教诲和信任。

2月25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小平同志的追悼会。会场外，数万人民群众自发地拥来，用各种不同形式为小平同志志哀。会场主席台正中悬挂着小平同志巨幅遗像，骨灰盒上，覆盖

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老同志都来了，悲伤不已，有的当场晕倒。江泽民主席致悼词，给予小平同志崇高评价，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继承邓小平同志遗志，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回顾以往，中国革命的航船遇到许多惊涛骇浪。可以说，正是在这艘航船最危险的时候，小平同志以高度的政治智慧和大无畏的革命胆略，及时调整了航向，领导中国人民走上改革开放之路，走上国强民富之路，使中国从晚清以来一直低落的国家形象，一变而成为一个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昂首挺立、举足轻重的国家。这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是小平同志对中华民族的巨大贡献。

凝望小平同志遗像，泪眼难干。追悼会后，国殇结束，五星红旗将重新升起，一切工作要回到正常轨道。作为一个跟随小平同志多年的老兵，我想到了自己今后的责任。

当天下午，中央军委召集邓小平治丧委员会成员中的军队在职干部和部分老同志开会，江泽民主席主持会议并讲话。我也在会上讲了话。我说，小平同志逝世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重大损失，大家都很悲痛。我们应该化悲痛为力量，以实际行动落实小平同志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指示。要保持稳定，保持部队的稳定，巩固国家的稳定，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创造稳定的环境。我们要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继承小平同志未完的事业。会议开得严肃而沉重。

为了更好地继承小平同志遗志，随后几个月里，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别在3月、5月、6月和8月连续四次开会，讨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十五大报告提纲和给政治局会议审议的送审稿。

我是做军队工作的。我告诫自己，一定要深刻领会小平同志在军事领域的一系列思想，认真贯彻，发扬光大，协助江泽民主席抓好军队工作。

众所周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小平同志既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总设计师，也是新时期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总设计师。以往工作中，贯彻落实小平同志的军事思想，也一直是工作的指针。

1991年初，全军军事科学研究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讨论通过全军八五期间军事科研工作规划。我和国防部长秦基伟、总参谋长迟浩田等出席了会议。早在1978年，小平同志曾为军事科学院题词：“继承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发展我国军事科学”，指明了军事科学繁荣与发展的方向。这次会议上，我强调指出：我们不仅要继续加强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研究，也要认真开展小平同志关于新时期国防建设、军队建设论述的研究。我是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名誉会长，组织和推动邓小平军事理论的学习和研究活动，责无旁贷。

当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高度评价了小平同志对我们党和国家建立的卓著功勋，要求全党认真学习小平同志的著作。9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江泽民主席提出，向列宁、毛泽东同志学习，也要向邓小平同志学习。为此，我找负责党的宣传工作的郑必坚同志深谈了一次。我认为，对小平同志的思想，我们理解了一些，还不深不透不彻底。比如，对于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的观点，人们没有任何异议，但到了精简整编，又不愿动了，强调打起仗来怎么办，发生问题谁负责。这是一种守摊子的观念，思想深处还是按照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那一套建设国防和军队。所以，如果学习运用小平同志的思想，解决我军在新的历史时期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是摆在广大官兵面前的一道不可回避的议题。

当年底，我在一次关于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和国防建设理论研讨会上提出：小平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是我军的主要领导和创始人之一。在长期革命战争中

和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参与了创立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实践活动，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在 60 多年领导指挥军队的实践中，创立和积累了许多宝贵的建军思想理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从新时期我国国防建设、军队建设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科学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创造性地回答了新形势下亟待解决的一些理论与实践问题，为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提出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科学理论。实践证明，小平同志的军事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平时时期军队建设的纲领，是我军各项工作的指南。

我对小平同志军事理论的丰富内容和鲜明时代特点作了归纳：

坚定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军事思想，这是小平同志军事理论最重要的特征。他最早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给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以公正评价，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他对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的论述，对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论述，对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论述，对军队坚持党的领导的论述，特别是关于干部队伍培养、建设的论述等等，都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直接继承和发展。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小平同志坚定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有巨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小平同志一再强调和坚持的思想路线。针对我国国情军情，他提出的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理论的一系列方针原则，都是坚持实事求是、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典范。他的军事理论，科学地反映了新时期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的客观规律，因而具有明显的实践性，深受广大官兵的拥护和欢迎。

善于从战略高度观察和判断问题，是小平同志重要的思想方法。无论国际国内风云如何变幻，他总是以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的眼光高瞻远瞩，一针见血地指出事物本质。他针对东欧、苏联剧变提出的战略方针，对把教育训练、科技和人才置于战略地位的论述，都表现出远见卓识的才华和善于抓住主要矛盾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

小平同志的理论和实践活动，充满彻底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的革命精神。他从不拘泥前人的过时结论和陈规旧范，而是面向实际，面向未来，以辩证的眼光观察问题，深思熟虑，做出新的论断。他对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的分析，他主张通过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一国两制”、继往开来，这一切无不具有划时代意义，充分显示出大无畏的理论勇气和杰出领导人果断决策的品质。我们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小平同志新时期国防建设、军队建设理论，就要努力掌握他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我在那次会上强调，我们这么大的军队，需要有伟大的理论，现在产生了伟大的理论，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在地学习和运用呢。我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贯彻执行小平同志的思想。当时，小平同志思想理论体系的称谓，没有统一提法，有称思想的，也有称理论的，党的十五大明确为邓小平理论。

小平同志去世后，我曾一次次翻看照片，回忆他的音容笑貌。相册里，有一张 1992 年在深圳迎宾馆与小平同志的合影。这一年，是中国历史的又一转折关口。 这年春天，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讲话。1 月 22 日下午，他在深圳迎宾馆接见深圳市党政干部。我正好在广洲战区考察部队工作，也参加了这次会见。当时小平同志已 88 岁高龄，仍然神采奕奕，思路敏捷。

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打破禁区，使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理论有了重大突破，成为又一次思想大解放的宣言书。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和巨大震动，加快改革的呼声遍及全国各地。中央马上把小平同志的谈话、包括后来在上海的谈话，综合成一个文件，向全党下发和传达，并召开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学习南方谈话，部署进一步改革开放问题。随后，一系列新的改革措施纷纷出台。

军队也在努力。当年4月，中央军委决定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学习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提高思想认识，研究部署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问题。

这是一次重要会议。为了贯彻落实小平同志思想，我作了充分准备。会上我说：“邓主席在规划整个国家改革开放事业的同时，还规划了军队改革的蓝图，提出了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总目标，提出了一整套有中国特色的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思想。”这些思想囊括了军队建设的方方面面，其中主要有：

“新的世界大战有可能或者说在较长时期内打不起来。我们要下决心抓住有利时机，加快经济建设的步伐。军队建设的立足点，必须由过去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上来。”

“国防建设必须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军人要在这个大局下行动。经济搞上去了，国防和军队建设才有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国防建设不是消极地依附于经济建设，而是对经济建设具有促进作用和保证作用。”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发扬我军优良传统。要把军队教育好，坚决维护党的基本路线和社会主义制度。我军要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忠于社会主义，枪杆子要永远掌握在忠实可靠的

人手中。”

“军队建设要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没有现代化科学技术，就没有现代化国防。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是军队和国防现代化的主要标志。一定要争取时间把武器装备搞上去。改善装备必须以国家经济和科技的不断发展为前提。要减少军队人员，把省下的钱用于更新装备。”

“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位置。现代战争是诸军兵种协同作战，要加强合成作战训练。通过大力办好院校来培养干部，提高干部素质。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军队要整顿，克服‘肿、散、骄、奢、惰’。军队要提高战斗力，提高工作效率，不‘消肿’不行。即使战争要爆发，我们也要‘消肿’。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编制就是法规。搞好军队的体制编制改革，可以带动解决军队的其他问题。”

“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建军的原则。重视现代战争中的后勤保障，加强我军的后勤建设。”

“未来反侵略战争是一场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我们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真正打起仗来，几百万军队也不够，要建设强大的后备力量。”

“要进一步搞好军政、军民关系。军队不但要成为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还应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力量。”

我强调指出：“邓主席关于新时期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的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全军广大指战员所拥护并被实践证明完全正确的现代军事科学理论，是和平时期我军建设的行动指南。”

可以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是在小平同志的指引

下，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战略性转变，在军事、政治、后勤、国防科技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军队建设出现了崭新局面，走上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军队的正确道路。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极大地鼓舞了我们深化改革的信心，加快了军队改革步伐。

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我要求全军，要进一步提高对小平同志军事理论指导地位的认识。小平同志说过，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对我们军队来说，改革就是提高战斗力。我们要更加牢固地树立起战斗力标准的科学观念，凡是有利于提高部队战斗力的，就要坚定不移地干。只有这样，才能把军队建设得更加强大，从而更好地捍卫改革开放，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现在我们已跨进新的世纪，历史翻开了新篇章。7年前，小平同志的骨灰已经撒在祖国的东海和南海，融入浩瀚的太平洋。他的精神，已经化身亿万，将继续激励中国人民前无古人的改革开放事业。展望未来，中华民族必将以更加强健而自信的身影，耸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小平同志90华诞时，我曾挥毫写过四个大字“功德无量。”这是我的由衷之言。

小平同志已经远去。

小平同志，我们永远怀念你！

（作者为中央政治局原常委、中央军委原副主席）

小平同志永生

宋任穷

我最早在小平同志领导下工作是在抗日时期。1938年1月，小平同志接替张浩同志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委员，我任政训处（后改为政治部）副主任。不久，我调任东进纵队政治委员、冀南军区司令员和政委。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我都是在刘邓的领导之下。解放战争时期，我在小平同志任书记的晋冀鲁豫中央局任组织部部长，后调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野战军任兵团政委，仍在刘邓麾下。建国后，又多次在小平同志领导下工作，经常有机会得到他的指导和教诲。

为了冀南根据地的发展和巩固，1938年12月下旬，刘伯承师长率一二九师主力部队从太行来到冀南。不久，邓小平政委也第二次来到冀南。这时刘、邓、徐首长都在冀南直接领导指挥我们，极大推动了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和巩固。

我向刘师长汇报冀南的情况，在说到冀南民众抗日情绪之高、对敌仇恨之深时，我举了两个例子，一是某些天主教徒在教堂做礼拜时，他们祷告：“保佑抗日军、保佑八路军、抗日军打胜仗、八路军打胜仗……”；二是一些老太婆也祷告我军打胜仗，还有的用白面粉做成小人，放在锅里煮。她们把小面人当成小鬼

子，说：这么一煮，日本鬼子就不得好死。这些虽然带有一些迷信的色彩，但却充分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爱和憎，人心之向背。

刘师长听后笑容满面，非常高兴。称赞冀南的群众基础确实不错，老太婆尚能如此，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

刘、邓首长到冀南后，在威县七级西之老虎张庄开了一次军政干部会，邓政委在会上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议。根据冀南斗争形势，会议确定依靠工农群众，依托广大农村，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坚持冀南抗日民主阵地。敌人将会更大规模“扫荡”冀南；未雨绸缪，要充分做好各项反“扫荡”的准备工作。敌人为了进攻西北，对华北特别是对河北平原，必然要来一次更残酷、更严重的进攻与“扫荡”。我们说服了一些盲目乐观的人，有人认为“敌人不会再进攻冀南了”，甚至有人说“以五百伤亡把河北日寇完全赶出去”。我们进行了长期战争动员，号召抗日政府、群众团体、一切游击队、切抗日正规军和广大人民，准备和日寇作长期斗争。

1939年1月初，敌人开始第二次“扫荡”冀南地区。其规模比第一次大得多。敌人从平汉、津浦铁路东西两线共出动日伪军3万余人，分十一路进行大规模“扫荡”。这次“扫荡”，敌人改变了第一次“扫荡”时长驱直入的战法，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进攻方式。首先占领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的村镇、要点，逐渐向中心区压缩，企图将我军聚而歼之。

刘、邓、徐首长亲自领导指挥冀南军民展开了反“扫荡”斗争。根据敌强我弱态势，决定撤出县城，将部队分成若干集团，分区游击，独立作战，互相策应，依托广大农村，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当时把在冀南的部队分成几个游击集团：“五旅集团”、“六旅集团”、“青纵集团”、“东纵集团”和“先纵集团”。我负责指挥“东纵集团”，活动在五分区地区。再道同志指挥“青纵集团”。

这次敌人大“扫荡”，直到2月上旬才结束。“扫荡”结束后，我们军区、区党委、行署联合开了一次总结大会。邓政委在会上做了报告，指出冀南地区的中心工作是进一步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加强政权建设。3月上旬，刘、邓首长安排了冀南全面工作后，率师部及三八六旅主力等返回太行。徐副师长继续领导指挥我们冀南的对敌斗争。6月初，他也奉命离开冀南，到山东去了。徐帅在冀南直接领导我们战斗一年多，我们朝夕相处，度过了多少难忘的日日夜夜，真舍不得他走。俗话说：“大树底下好乘凉”，有师首长在冀南，我们感到有主心骨，心里踏实。师首长先后全走了，冀南的领导工作落在我和再道、宏坤、志坚以及李菁玉等同志肩上，深感担子沉重。

1949年1月和3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七届二中全会就做出决定，由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负责接管西南各省。随后，对二野进军西南的时间、任务及组织领导等问题做了具体指示。着手做进军西南准备工作的时候，突出的问题是干部不足。我们南下时，从太行、太岳带来一批干部，准备到西南去的。到南京后，饶漱石向邓小平同志提出，福建缺干部，希望把太行、太岳带来的干部都给福建，并说可以给一部分山东的支前干部随二野去西南。小平同志顾全大局，很痛快地答应了，说我们再另想别的办法吧。此后，根据小平同志的建议，我们除了从中央和老区选调一部分新闻、邮电、财经、公安等方面的干部以外，从上海、南京等地吸收一部分知识分子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1949年6月25日，西南服务团正式成立，由我任团长。上海、南京两地分别由曹荻秋和彭涛同志负责。当时，年轻人革命热情很高，报名十分踊跃，一时间参加西南服务团的浪潮席卷许多院校、工厂、机关，报名的人排成长龙，总数达两三人之众。有不少大学生、中学生，其中有进步学生运动的骨干、中共地下党党员和党的外围组织成员，他们有强烈的反美反蒋情绪和